

客观事实与主观分化： 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观阶层认同分析

胡 荣 沈 珊

摘要：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中产阶级崛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差别和阶层分化日益凸显。社会分层不仅是一种客观事实，还与个体的主观意识密切相关。本文基于 CGSS2010 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自我认同已出现明显分化，教育和收入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重要意义，生活经历是建构主观阶层认同的重要变量，但制度分割的影响不具统计意义。

关键词：中产阶级；主观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日常生活经历

DOI:10.13658/j.cnki.sar.2018.05.017

作者简介：胡荣，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沈珊，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1569(2018)05 - 0138 - 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在这双重转变过程中，中产阶级崛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差别和阶层分化日益凸显。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已形成了以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和社会流动机制合理化为重要标志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①但研究者大多从社会经济指标等客观标准来建构个体的阶层归属，较少关注个体的阶层从属意识。西方社会的发展经验表明，以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为支撑的稳定社会阶层结构不仅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都达到了较为丰裕的水平，更重要的是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必须具备“中层以上”的阶层意识或阶层认同。^②因此，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的地位分层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回顾

阶层意识是“居于一定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体对社会不平等状况及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意识、感受和评价”，其基础不仅在于物质经济利益方面的差别，还包括各种经济、权力、文化等资源的不公平分配。^③主观阶层认同作为阶层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

①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② 赵延东《“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③ 刘欣《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个人对其自身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①学界关于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探究,大致可以划分为结构地位论、历史文化论、精英策动论和国家中心论等四种观点。^②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本文只对结构地位、历史文化和国家中心三种论点进行探讨。

结构地位论认为个体的阶层认同是由其对社会结构中的客观地位所决定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一元决定论认为,个体的阶层地位归根结底取决于其生产资料占有状况;韦伯主义传统的多元论观点则认为,这取决于收入、权力和声望等多方面的情况。后续很多研究者把这两类基于不同理论传统的变量综合起来分析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但从根本上看,学者们还是认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主观阶层认同有决定性影响。客观社会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在国内研究中已得到了证实,^③尽管两者间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④

历史文化论在强调客观社会地位重要性的同时,也重视文化传统和生活经历等因素对阶层认同的影响。汤普森认为,结构地位是阶层形成的客观条件,但阶层形成更多是因为“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得出某种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⑤可见,日常生活中的“共同经历”才是阶层认同形成的关键因素,而生活休闲方式、消费观和相对剥夺感等都是日常生活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方式可看作是通过生活实践展现出来的阶层关系,不仅表明自己的阶层身份,也表明自身与其他阶层之间的距离。^⑥而消费亦体现出个人社会地位的符号和差异。因为在现代社会的消费关系中,人们“消费的从来都不是物的本身(使用价值),而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当做能够突出自己的符号”,^⑦人们在消费中获得某种特定的符号认同并以此区分其他群体或阶层,^⑧从而建构出不同的阶层认同。有关相对剥夺感与社会分层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人们在社会转型时期生活际遇方面的变化,尤其是社会地位的相对变动,能更好地解释阶层认知的差异;因为分层机制的变化必然使一部分人在社会经济地位或生活际遇上处于相对剥夺的状态,一旦处于相对剥夺地位,无论其占据的实际客观地位的高低,个体都会倾向于作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⑨相对剥夺感越强的个体,其主观阶层认同的层级更低。^⑩而这种社会地位的相对变动,或者说相对剥夺感的获得,直接体现在个人自我阶层认同的变化上。

- ① Jackman M. R., Jackman R.,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3, 38(5): 569-582.
- ② 冯仕政《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和分层认同》,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 展研究报告 2009: 走向更有共识的社会: 社会认同的挑战及其应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3-185 页。
- ③ 卢富营、张兆曙《客观地位分层与主观地位认同》,《中国人口科学》2006 年第 3 期;肖日葵、仇立平《“文化资本”与阶层认同》,《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 年第 6 期;胡荣、张义祯《阶层归属与地位认同问题研究》,《东南学术》2005 年第 6 期;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2008 年第 2 期;胡建国等《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6-77 页。
- ④ 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构成及比例》,《中国人口科学》2003 年第 6 期;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2008 年第 2 期。
- ⑤ 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前言。
- ⑥ 刘欣《阶级惯习与品味: 布迪厄的阶级理论》,《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6 期。
- ⑦⑧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1、76 页。
- ⑨ 刘欣《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 3 期。
-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城市人口的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4 年第 5 期;李培林、张翼、赵延东、梁栋《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张海波、董星《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自我认同——基于南京市 561 位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2 期;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2008 年第 2 期;陆益龙《态度、认同与社会分层的主观建构——基于 2008CGSS 的描述性分析》,《湖南社会科学》2011 年第 5 期。

国家中心论从宏观视角分析阶层认同,强调国家政策、性质和行为等因素的影响,认为“国家是特定疆域内权力最为强大的机构,在塑造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认同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①汤普森在分析阶级形成时特别强调“阶级经历”的重要性,而“阶级经历”必定包含着工人与国家的互动,工人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的产生与国家政策直接相关。^②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分割、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等制度性安排及社会实践变迁,对个体的阶层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户籍作为城乡二元分割的典型制度,不仅区分了个体的物质利益,也赋予了个体不同的政治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③此外,由于不同地域的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倾斜所导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可能对个体的阶层认同产生重要影响。^④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有效样本总量为11785人。具体抽样设计方案参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网站。^⑤

(一) 中产阶层的操作化测量

虽然“中产阶级”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但在其测量方法上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研究者从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两大方面对中产阶级进行了界定,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逐渐将其融合,用一套指标体系从多方面对中产阶级进行综合判定。^⑥本文对中产阶级的界定,借鉴已有研究的测量方式,用收入、职业和教育三个指标进行综合判定。

本文参照李培林和张翼^⑦的划分方式:收入上,以中国城镇户籍人口的年收入均值(M)为基准,把收入高于均值(M)的群体定义为“收入中产阶级”;把收入介于均值的50%(0.5M)到均值(M)之间的群体定义为“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小于等于均值50%(0.5M)的人群则为“低收入阶层”。职业上,把领取薪金、具有一定管理权限或者技术水平的非体力劳动者定义为“职业中产阶级”(不包括体力劳动管理人员),包括自雇和雇主等;把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半技术半体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管理人员界定为“职业中低层”;把农民、无业失业人员和待就业人员定义为“职业低层”(不包括学生)。教育上,把拥有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凭的人员定义为“教育中产阶级”,拥有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和技校等学历的人员为“教育中低层”,拥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为“教育低层”(具体分层情况见表1)。

- ① 冯仕政《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和分层认同》,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9:走向更有共识的社会:社会认同的挑战及其应对》,第153-185页。
- ② 陈峰《国家、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形成——西方文献及其对中国劳工问题研究的意义》,《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
- ③ 李飞《客观分层与主观建构:城镇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既往相关研究的梳理与验证》,《青年研究》2013年第4期。
- ④ 李培林、张翼、赵延东、梁栋《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3-7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城市人口的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5期。
- ⑤ 详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网站”:<http://www.chinagss.org/index.php>。
- ⑥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253页;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构成及比例》,《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6期;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2008年第2期;张建明、洪大用、郑路、吴善辉《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 ⑦ 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2008年第2期。

表1 收入分层、职业分层和教育分层的比较

收入分层	有效百分比(%)	职业分层	有效百分比(%)	教育分层	有效百分比(%)
低层	60.9	低层	61.3	低层	65.3
中低层	22.4	中低层	21.3	中低层	19.2
中层(收入中产)	16.7	中层(职业中产)	17.4	中层(教育中产)	15.4
N = 10152	100.0	N = 11711	100.0	N = 11760	100.0

按照收入、职业和教育三个分层指标对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进行估算,数据显示,三个指标都达到中产标准的人群比例仅为5.4%,符合两项中产标准的人群占比9.2%,而符合一项中产标准的人群占比17.8%。本文从广义上界定中产阶层,即将符合任一中产指标的个体都视为中产阶层。即便这样,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仅有32.4%(样本量为3430)。

(二) 因变量: 中产阶层的主观阶层认同

问卷中将社会阶层划分为1-10分共10个等级,10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通过询问受访者“您认为自己目前处在哪个等级上”来测量其主观阶层认同。总体而言,如果我们把自我认同在5分和6分的群体界定为社会中等水平(中层),那么41%的社会成员其自我认同处在社会中等水平,自认属于中间阶层;6%的社会成员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自我认同高于7分)。而在中产阶层中,主观阶层认同在中层及以上的比例达62.2%。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自我认同差异明显。

(三) 主要预测变量: 社会经济地位、日常生活经历和制度分割因素

1. 社会经济地位

如前所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相关性已经得到诸多研究的证实。本文结合中产阶层的操作化测量指标,从教育分层、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三个方面来考察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

2. 日常生活经历

尽管相似的收入水平、职业地位和教育资本等因素决定了人们的客观阶层地位,但即便是相同社会阶层的群体,不同的生活经历也会导致主观阶层认同的差异。本文从生活休闲方式、消费观和相对剥夺感三个方面考察个体的生活经历。

(1) 生活休闲方式

生活(休闲)方式受阶级阶层归属的制约,不同社会阶层往往有不同惯习,当阶层惯习外化为实际行动时,就会形成各自独特的品位和生活休闲方式^①并进一步建构出不同的阶层认同。问卷中对生活休闲方式的测量主要是通过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一年的空闲时间中对下表所列的12项活动的参与频率来实现。该问题的选项为每天、一周数次、一月数次、一年数次或更少和从不,分别赋值1-5分。为了便于描述分析,我们将其反向赋分,分值越高表示从事某项活动的频率越高,通过主成分法并经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提取了三个因子(KMO = 0.862, alpha = 0.822)。第一个因子命名为“发展享受因子”(特征值3.229,解释方差26.9%),包括出去看电影、读书、参加文化活动、在家听音乐、参加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和上网7个项目(因子负载分别为0.665、0.710、0.623、0.627、0.525、0.537和0.765);第2个因子命名为“文娱社交因子”(特征值为1.628,解释方差13.56%),包括看电视或者看碟、逛街、与不住在一起的亲

① 肖日葵、仇立平《“文化资本”与阶层认同》,《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戚聚会等 3 个项目(因子负载分别为 0.724、0.536、0.577 和 0.446) ; 第 3 个因子命名为“自我消遣因子”(特征值 1.069 ,解释方差 8.9%) ,只有做手工一个项目(因子负载 0.873) 。

(2) 消费观

社会阶层之间的消费观分化已经相当明显 ,正是这种消费观念的区隔将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明显区分出来 ,并进一步建构出不同的阶层认同。本文对消费观的测量是通过问卷中的 6 个问题(有了多余的钱首先考虑的是存起来; 买东西应该讲究实用 ,是不是名牌不重要; 周围的人有的名牌货 ,我也得有; 日常吃饭可以简朴点 ,但是穿着得讲究; 透支消费很正常; 穿名牌 ,面子上会好看些) 的看法分析而来。采用李克特量表的方式估量 ,选项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 ,分别赋值 1 - 5 分。为了保持逻辑一致性 ,我们把第一、第二个问题进行了反向处理 ,通过主成分法对这 6 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并经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提取了两个因子($KMO = 0.713$ ($P < 0.001$) , $\alpha = 0.675$) 。第一个因子命名为“攀比型消费观因子”(解释方差 31%) ,第二个命名为“实用型消费观因子”(解释方差 22.23%) 。

(3) 相对剥夺感

如前所述 ,相对剥夺感的获得直接体现在个人自我阶层认同的变化上。本文通过询问受访者个人的阶层流动和家庭的代际流动来测量其相对剥夺感。具体而言 ,通过被访者对近十年来自我阶层认同的变化(即“您认为自己目前处在哪个阶层等级”和“您认为自己 10 年前处在哪个阶层等级”的差值) 来测量其个人的阶层流动; 家庭的代际流动测量则通过受访者对自己当前的自我认同与孩提时代的家庭阶层认同的变化(即“您认为自己目前处在哪个阶层等级”和“在您 14 岁时 ,您的家庭处在哪个阶层等级”的差值) 来实现。如果说受访者在个人阶层流动或/和家庭代际流动的分值为负数 ,即出现了阶层认同的向下流动 ,说明其生活水平下降 ,已经产生了相对剥夺感 ,且分值越低 ,相对剥夺感越强。

3. 制度分割

阶层认同的国家中心论强调宏观结构的影响 ,关注国家政策、性质和行为的作用。借鉴已有成果 ,本文主要从户籍的城乡二元区别(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和地区差异(东部、中部和西部) 来考察制度分割因素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表 2 主要预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人口统计学特征(控制变量)					
性别(男性 = 1)	0.57	0.495	0	1	3430
年龄	40.68	13.90	17.00	94.00	3428
年收入对数	4.46	0.382	2.95	6.78	2865
政治面貌(党员 = 1)	0.26	0.44	0	1	3425
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教育分层 ^a	2.27	0.84	1	3	3427
职业分层 ^b	2.39	0.82	1	3	3395
收入分层 ^c	2.37	0.80	1	3	2973
生活经历变量					
主观阶层认同	4.66	1.58	1.00	10.00	3420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家庭代际流动	0.97	2.08	-9.00	9.00	3430
个人阶层流动	0.71	1.66	-9.00	9.00	3430
攀比型消费观因子	0.0675	0.9641	-2.1687	3.8039	3391
实用型消费观因子	0.3185	1.0951	-1.9494	4.3750	3391
发展享受因子	0.7771	1.0336	-1.4683	4.2825	3330
娱乐社交因子	0.0796	0.9219	-3.5415	3.7827	3330
自我消遣因子	-0.0351	1.0137	-2.2520	4.4364	3330
制度分割变量					
户籍(非农户口=1)	0.77	0.42	0	1	3423
地域分布 ^d	2.42	0.76	1	3	3430

注: a. 教育低层 = 1 教育中低层 = 2; 教育中层 = 3; b. 职业低层 = 1 职业中低层 = 2 职业中层 = 3; c. 收入低层 = 1 收入中低层 = 2 收入中层 = 3; d. 西部地区 = 1 中部地区 = 2 东部地区 = 3。

三、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中产阶层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见表3)。多重共线性诊断表明,所有变量的 VIF 值都在 1-5.5 之间,各变量间基本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表 3 中产阶层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V
	B(S.E)	B(S.E)	B(S.E)	B(S.E)
性别 ^a	-0.225(0.061) ***	-0.189(0.062) **	-0.250(0.059) ***	-0.252(0.059) ***
年龄	0.003(0.002)	0.002(0.003)	0.004(0.002)	0.003(0.003)
年收入对数	0.960(0.077) ***	0.986(0.132) ***	0.717(0.118) ***	0.719(0.119) ***
政治面貌 ^b	0.287(0.067) ***	0.237(0.072) **	0.093(0.063)	0.090(0.064)
社会经济地位假设				
教育中低层 ^c		0.130(0.081)	0.271(0.074) ***	0.264(0.078) **
教育中层 ^c		0.073(0.075)	0.209(0.076) **	0.192(0.083) *
职业中低层 ^d		-0.254(0.107) *	-0.173(0.094) +	-0.176(0.095) +
职业中层 ^d		0.084(0.089)	0.014(0.079)	0.008(0.080)
收入中低层 ^e		-0.167(0.108)	-0.229(0.095) *	-0.234(0.095) *
收入中层 ^e		-0.039(0.136)	-0.110(0.121)	-0.117(0.121)
生活经历假设				
家庭代际流动			0.287(0.015) ***	0.287(0.015) ***
个人阶层流动			0.119(0.019) ***	0.120(0.019) ***
攀比型消费观因子			0.090(0.027) **	0.093(0.027) **
实用型消费观因子			0.052(0.024) *	0.053(0.024) *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V
	B(S. E)	B(S. E)	B(S. E)	B(S. E)
发展享受因子			0. 138(0. 033) ***	0. 137(0. 033) ***
娱乐社交因子			0. 119(0. 029) ***	0. 114(0. 029) ***
自我消遣因子			0. 062(0. 028) *	0. 058(0. 028) *
制度分割假设				
户籍 ^f				0. 040(0. 073)
中部地区 ^e				-0. 093(0. 081)
东部地区 ^e				-0. 076(0. 074)
Constant	0. 296(0. 351)	0. 192(0. 531)	0. 893(0. 472) +	0. 956(0. 480) *
N	2754	2754	2754	2754
Adjusted R ² (%)	6. 3	6. 9	27. 7	27. 6
F	46. 944 ***	21. 379 ***	62. 934 ***	53. 557 ***

注: 1. + 表示 $P < 0. 1$, * 表示 $P < 0. 05$, ** 表示 $P < 0. 01$, *** 表示 $P < 0. 001$; 2. a、b、c、d、e、f、g 的参考类别依次为“女性”“非党员”“教育低层”“职业低层”“收入低层”“农业户口”和“西部地区”。

模型 I 为考察了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男性,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更高;收入是影响自我认同的关键因素($B = 0. 960$);政治面貌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政治资本,对自我认同也有显著影响,党员比非党员的自我认同等级更高;年龄对主观阶层认同不具显著性影响。

模型 II 为社会经济地位假设模型。在新加入的变量中,仅有职业分层具有显著影响,教育分层和收入分层的影响都不具统计显著性。相对于职业低层,职业中低层成员的主观阶层认同更低($B = -0. 254$)。

模型 III 为生活经历假设模型,加入相关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增加到 27. 7%,表明生活经历是主观阶层认同的重要预测变量。相对于模型 II,政治面貌的显著作用被消解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影响作用变化十分明显。相对于教育低层,教育中低层和教育中层的主观阶层认同等级明显更高,教育是影响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相对于收入低层,收入中低层的自我认同等级反而更低。收入是影响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但也存在认知偏差。收入低层民众更多关注物质生活和自身条件的改善,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便容易产生满足感和认同感;而收入中低层和收入高层更多关注精神需求和社会生活,更能敏锐地感知社会收入的巨大差距,清楚地认识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主观阶层认同反而更低。生活经历变量是解释自我认同的重要维度,相对剥夺感、消费观和生活休闲方式三个因素对主观阶层认同都呈现出正向相关性。具体说来,在相对剥夺感因素中,家庭代际的向上流动和个人的向上流动都有助于阶层认同的提升。当个体的参照体系是自己的过去时,“相对剥夺感”,确切地说是“相对获益感”是影响个人主观阶层认同的重要因素。在消费观因素中,当消费行为被附加上价值观念和符号等象征意义时,无论是实用型消费观还是攀比型消费观,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主观认同。在生活休闲方式各要素中,发展享受因子、娱乐社交因子和自我消遣因子都有助于自我认同的提升。可见,无论选择何种方式,只要是参与了休闲活动都将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积极影响。生活休闲方式的巨大差别是社会分层的直观表现之一,当这种差异外化为实际行动时,更易于形成相同或者相似的阶层认同。

模型 IV 主要考察制度分割因素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但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分割各要素

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都没有统计显著性。

四、结论与讨论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不仅体现在个体客观经济地位的改变,也体现在其主观阶层认同的变化。基于CGSS2010的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日常生活经历和制度分割因素对中产阶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虽然在客观经济地位上处于优势的中层群体开始承认自己是有别于工人和农民的中产阶级,独立的阶层意识正在成长,但更大量的中产阶级群体其阶层意识尚未觉醒,自我认同仍然有待提高。

首先,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往往以其在现实社会中所处的客观位置为参照。尽管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主观阶层认同也越高。^①但本文的研究却发现,在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中,只有教育与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正向相关性,而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优势并没有导致更高的自我认同。不过结合年收入对数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来看,虽然相对的收入分层与自我认同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但绝对的收入水平却有助于自我认同的提升。这是因为在对收入进行分层时,每一层级的上下限之间差距较大,导致即使处于相同收入层级的群体,其内部差异仍然十分巨大。而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现代性职业的兴起提供了必需的劳动技能,也为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了精神文化基础。教育不仅是区分社会成员客观阶层归属的重要变量,也是个体主观阶层认同的重要参照指标。总的来说,教育和收入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生活经历是建构主观阶层认同的重要变量。只要公众自认为在分层机制的变化中生活际遇得到了改善,或者说在社会结构中实现了向上流动,无论其客观的经济地位如何,他们都倾向于更高的自我认同;相对获益感有助于主观阶层认同的提升。此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制度和政策环境的重大变迁导致了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和阶层结构的优化重组,构建不同社会阶层的基础由原先的政治身份转化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种资源的融合,具体表现形式为不同的意识形态、生活和消费方式。^②而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阶层分化,正是中产阶级进行“意义”建构、“品位”区分、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区隔过程,在此过程中,中产阶级积极寻求其身份、地位认同,并不断形成和强化自己的消费特征与文化。^③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阶层分化已经成为了中产阶级界定自身社会阶层属性的重要考量因素。

最后,制度分割因素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不具统计意义。本文并没有发现户籍的城乡二元分割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对主观阶层认同的显著影响。户籍制度的改革打破了管理制度上的城乡割裂,为自由的社会流动创造了积极的条件,摆脱了制度桎梏的民众可以基于“经济理性人”的考虑,作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因此,大量的流动机会(城乡流动和区域流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二元户籍区分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责任编辑:郑珊珊 童传轩)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城市人口的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5期;胡荣、张义祯《阶层归属与地位认同问题研究》,《东南学术》2005年第6期;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2008年第2期;胡建国等《中国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② 田丰《消费、生活方式和社会分层》,《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③ 王建平《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消费行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